

新闻关注



普京高调反腐 多名高官落马

上个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因腐败被免职,前农业部长(图)身陷腐败丑闻,多名高官被捕和解职,媒体称,在这场风暴中,普京总统扮演了反腐斗士的角色,也挽救了自己下降的支持率。



华裔少女变地沟油为宝 受奥巴马接见

14岁的美国华裔女孩林心瑜将原本废弃的厨房剩余油脂转化成采暖用的生物燃油,造福众多贫困家庭。她因此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接见,并当选为美国(CNN)选出的三位“青年奇才”之一。



印度尼西亚男子与老虎成为朋友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男子将一头雌虎从小养到4岁,他与老虎一起住、一起玩,成为感情深厚的好朋友。



网络猫咪 神似蝙蝠侠

最近网上一只猫咪的照片引起围观,这只猫咪两只竖起的尖耳朵和有些邪恶吓人的眼神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了经典银幕形象——蝙蝠侠。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当推土机轰隆隆地作业时,任锡海常常在场,与老房子的倒塌声一起响起的照相机的快门声,像是一位摄影师发自本能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是如此的无力。

任锡海:记录里院最后的身影

□ 本报记者 梁旭日

周末感言 巨资重建古城

□ 吴江

“拆旧”和“仿古”的大戏正在中国城市加速上演。一边,部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岌岌可危,历史文化街区频频告急;一边,55亿再造凤凰,千亿重塑汴京,仿古建筑遍地开花。这一切正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风景。北大教授称,“政府立项,老百姓买单,直到一代代还债还清。”(《南方周末》)

相比“拆除”所不可避免对城市文脉与肌理造成的伤害,“重建”无疑体现出对城市生命的呵护与修复。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重建古城”,连“巨资”都不吝惜投入,城市保护的观念是不是得到了根本转变,城市是否有望恢复历史文脉并展现其古韵魅力,似乎也有理由期待。

事实上,巨资重建古城的这些城市,的确有着辉煌厚重的城市历史,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的确没有理由不去珍惜这些最珍贵也最值得骄傲的城市资本。“重建古城”,从形式上与建筑外表上重现当年的恢弘,似乎也来得最直截了当。而既然有财政巨资投入作为保障,古城“重生”,要说也只是时间问题,并无太多悬念。

不过,有道是“砍树容易栽树难”,城市何尝不是如此。破坏拆除殆尽的古城,是否真的只要不差钱,便能原原本本的“重建”?显然需要打上几个问号。事实上,即便在工艺上,在建筑形式上完全可以复原古城,甚至凭借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修旧如旧。但真正引人遐思,令人驻足流连的历史痕迹与古城风貌,显然不是投资与修缮便能复原的。正如一位建筑学家所指出的“如果什么东西都可以再造,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城其实不能被“重建”,而“重建”出的也已不是古城。

那么,“巨资重建”的假如不是古城,又是啥呢?乍一看,“重建古城”的确与以往的“拆旧建新”不可同日而语,恢复古城风貌或许也是其初衷之一。不过,如果因此便认为这是与过去城市建设理念的决裂与纠偏,恐怕仍过于乐观。某种程度上,“巨资重建古城”与过去的“巨资造新城”,甚至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骨子里的“造城冲动”却未尝不是如出一辙。放在“地产造城”政策日益收紧,旧有的造城路径难以持续的背景下,“重建古城”无论是工程项目之巨,投资额度之巨,以及GDP的拉动效应,都使之具备了“地产造城”接盘者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政府热衷“重建古城”,甚至不惜巨资投入的背后,与其说真是为了城市文化的修复,毋宁说葫芦里卖的仍然是“拆来建去”的老药。只不过,这回建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改建城墙楼台罢了,除了建筑的形式变了,造城的风格改了之外,骨子里的逻辑其实丝毫未变。

当然,即便“重建古城”与保护古城无关,而仅仅作为投资项目,醉翁之意在于“重建古城”后的旅游经济,要说也并非无可。但就算是投资项目,也并非可以兴之所致,便大张旗鼓,“重建古城”的投资准备多長時間收回,项目的收益率如何,一旦投入形成负债,由谁来担?显然需有明确的评估与公示。否则的话,“巨资重建古城”会否成为又一轮泡沫游戏,重建的古城会否成为压在市民头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也就绝非凡人忧天。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当别人拿起相机追逐远方时,他却默默地把镜头对准了身边,记录下了作为青岛里院代表的“十号大院”长达二三十年的日常生活。

这些照片以质朴、透明的黑白语言,展示着长期生活在十号大院的人们的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被评论者认为如同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水乡泥腿子的描述一样,具有人类学意义。与此同时,通过对里院这一青岛特色建筑的长时纪录,这些照片也呈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他,就是记录了里院最后身影的任锡海。

一场展览,一次讲座

一场酒,和三言两语,任锡海对十号大院的记录,成了策展人臧杰“我的青岛”计划的首展。展览期间,任锡海还被邀请去作了一次讲座。

天已转凉,坐在投影仪前的任锡海,一头白发随意立着,声音细弱而沙哑,以至于坐在后排的听众听不太清楚。

“大家都在家看电视吧?”讲座开始前,他这样问臧杰,对于能否有人来听心里没底。结果却是,来了四五十人,静静的现场散发着“我们是一伙的”气氛。

听众提问环节,大家展开了一场对于摄影应该“追逐远方”和“关注身边”的讨论。任锡海说,自己在对摄影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1973年,他开始在青岛市群众艺术馆,从事群众摄影辅导、培训、组织等工作。没事的时候,也像别人一样往外跑,到新疆,到西藏,寻找远方的美。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他。

1980年,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到青岛讲学时,曾到十号大院看望任锡海的母亲。站在楼台上,面对五十多户人家的夏日生活场景,激动地对他说:“把大院拍下来,把大院人拍下来,把大院的生活拍下来,这很有意义,非常重要。”

尽管不能完全理解蒋齐生的意思,也不清楚应当如何去拍。但任锡海并没有忘记这一番话,开始时常给家人、邻居拍些照片。特别是母亲,很愿意让他给拍照片,并盼望着自己的照片能“上展览、上报纸”。

1998年,母亲故去了。没有满足母亲“上报纸、上展览”的愿望,这让任锡海十分愧疚。母亲的去世,点醒了他。他意识到:“如果再不拍,说不定哪天大院也会像母亲一样突然离去。”

从此,他把拍摄对象从远方拉回了身边,用更多的时间去记录大院,并且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

正是这组关于十号大院的照片,给任锡海带来了认可和骄傲:2001年,在德国举办的“徕卡·奥斯卡·巴纳克国际摄影比赛”中获优胜奖;同一年,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获得马克·吕布、雅各布森等摄影名家的好评;2008年,入选法国文化部举办的“梦想中国 现实中国”摄影展。今年,这组照片以《十号大院》的书名在香港出版。

“这里没有什么现代后现代好说事”

任锡海说,之所以能有这组作品,最重要的是“感谢母亲”——如果不是母亲把他生在十号大院,如果不是母亲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并且始终不肯搬家,如果不是母亲把对大院的爱传递给他,他就没有这组作品。

但是,摊开画册或者观看展览,你又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组照片超越了报偿母亲的感性层面,给人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感。

《中国摄影》杂志高级编辑王保国,把任锡海的照片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相比,将其划分为人类学意义的摄影。

在他看来,《江村经济》说的就是太湖边上一个村庄的房子大小、鱼塘位置、耕作的季节、人干什么活、每年能挣多少钱、下雨对桑蚕的影响等等,说的就是这些水乡泥腿们的日常生活。这本书的重要性,固然在于它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但同样重要的,还在于费孝通留学归来仍然保持着的叙述的浅显、质朴和明晰,那是一种写百姓、又让百姓能读懂的文字。任锡海对十号大院的记录实际上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类学摄影:他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明晰的,都是他十号大院里的兄弟姐妹一看就懂,一看就乐,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某个瞬间的状态。这里没有什么现代后现代好说事。翻看《十号大院》一书,理解这一评价并不

来自十号大院的任锡海(右)



这就是任锡海跟拍了二十多年的十号大院。



1987年,任锡海的母亲(左)向邻居展示二儿子从新疆寄来的照片



夏天,居民在十号大院楼台上边吃饭边聊天(上图)。

拆迁前,任锡海几乎每天都到十号大院去(左图)。

困难。一张张的照片,描述的全都是十号大院的日常生活:女人梳发男人打酒;刚刚结婚的小两口;邻居们围坐在一起打打牌;老人去世了,晚辈为其送行;房子要拆了,老人们留下了眼泪……

这些照片看上去是那么平静,却能在人的内心掀起波澜。

王保国认为,说这些照片是一种人类学意义的摄影,还在于:摄影师不是记录了十号大院居民一天、一个月、一年的生活。他的这些照片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这里的居民50年来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一直是这样生活的;就像《江村经济》揭示了中国江南乡村的居民自明朝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的生活方式一样。

当然,这要归功于任锡海的坚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生最好的时候都在十号大院了。”

里院,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这些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照片,通过对青岛里院这一独特空间的长时纪录,也堪称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1898年,借口“曹州教案”发生,德国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德皇威廉二世将租借地命名为Tsingtao(青岛)。从此,这个胶州湾畔的小渔村开始了向现代工业城市转变的城市化进程。

由于外来文化的干预,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多了些“洋味”。它不似北京、西安,也不像济南等山东内地一些城市,没有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也不讲究左右对称。和道路一样,路旁两侧的民居建筑也不受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拘束,而是依地势高低起伏而设。这体现着一种自由和随意的精神,洋溢着一种现代意识。

这些被称为“里院”的民居建筑,多以岩石为基础,以砖和水泥砌墙,以木板铺地,以红瓦盖顶,且多为两到三层,大多是方形、长方形,也有些是梯形,或者多边形。从外部看上去,里院很像西方电影里的欧洲老建筑,而在内部设施上又到处可见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和符号,呈现着一种“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建筑风格。里院的底层房屋面积通常为二十几个平方,开有临街的门,可以用于开店经营。二楼和三楼则多为十



夏天,居民在十号大院楼台上边吃饭边聊天(上图)。

拆迁前,任锡海几乎每天都到十号大院去(左图)。

几平方一间的住房。院子中央有供管理人员——当年的“物业”使用的小屋。厕所和水龙设在楼下,是公用的。因此,里院可以被看成是青岛最早的廉租房和商住两用楼。

二十世纪初,青岛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建设的需要吸引了周边许多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小商人的涌入,租价低廉的里院成为了这些新移民的落脚点。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料显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青岛已建有里院505座,房屋16701间,住家10669户。

正是在这个时期,任锡海的父辈从掖县(莱州)来到了青岛,几经辗转,租下了位于邱县路的十号大院“德盛里”三楼上一间窗户朝向西南的房子。并且,住下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由于第一代“里院人”多来自农村,他们在来到城市的同时,也把农村的生活方式带到了这里。生活中,居民和以往在农村时一样,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和农业生产相关的节庆特别重视。平日里,邻居间以“大爷”“大娘”“大哥”“大姐”互称,让人听起来很像一家人似的,到处洋溢着温馨和亲情:今天你借我一棵葱,明天我借你一勺盐;孩子放学了,大人不在家,邻居大娘会让他进屋做作业;下雨天,你不必担心晾晒的衣服没人管,邻居会帮你收起来并叠得板板正正……

王保国认为,正是和邻居们朝夕相处的几十年,使任锡海轻而易举地克服了摄影师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沟通”、“理解”之类的障碍——正是这些障碍,使得绝大部分从事记录工作的摄影师的照片难以抵达生活的深处,摄影师好像飘在现场之外。他如此评价任锡海的照片:那些照片中的一张和其他的照片在一起,摄影师和照片中的人物在一起,就像天空中飞着的一只天鹅和一群天鹅在一起一样和谐;或者像河中一只鸭子和一群鸭子呆在一起一样自在。

任锡海这样表达拍摄的便利和自然:“早晨起来,看见邻居在阳台上给女儿梳头,拎起相机过去就拍了。”

无力的抵抗

进入新世纪,青岛和绝大多数国内城市一样加快了旧城区、城中村改造的步伐。随着周围的“小港湾改造”启动,“小岗楼子”被推倒,十号大院将要拆迁的消息也在居民间口耳相传着。

2007年3月,拆迁公告张贴出来了。闻讯而来的邻居,把张贴公告的墙面包围了起来。大家的言谈中,既有对住进新房的期盼,也有对拆迁政策的疑问,还有对这座大院的留恋。

任锡海观察,人们对拆迁的态度各异,尤其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差别明显。“老人多数舍不得,一些老邻居要分手了,哭得厉害,因为在这生活时间久了,有了深厚感情。年轻人则觉得,可算要拆迁了,可以住新房子了,这里厕所公用,洗澡也不方便,他们也不怕孤独,把门一关,自己玩电脑就行了。”

拆迁公告张贴出来之后,任锡海和几户邻居开始呼吁,希望能把十号大院保留下来。一个月后,从当地媒体上传出十号大院等20多个里院将被保留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在照片上,秋霞大姐把刊登着这一消息的报纸举过头顶,脸上闪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2007年11月,十号大院的拆除还是开始了。没多久,就只剩下秋霞大姐居住的那一小部分还孤零零地矗立着。后来,不愿搬走的她经历了“钉子户”的普遍遭遇。冬去春来,秋霞大姐竟又坚持了半年多。但是最终,孤独、惶恐、不安让她坚持不下去了,抱着粘有丈夫和子女照片的玻璃板走出了家门。

这段时间,任锡海基本上每天都到十号大院去,游走在堆积如山的砖石、散落满地的门窗之间。当推土机轰隆隆地作业时,任锡海常常在场,与老房子的倒塌声一起响起的照相机的快门声,像是一位摄影师发自本能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是如此的无力。

“摄影力量很弱,和大院一样,推土机一推就没了。”任锡海低着头说。

母亲的离世,曾让他品尝过生离死别的滋味。大院的拆除,他再次体验了分别的痛苦,因为这里有任家上下三代的家族史。被茫然和无助笼罩的任锡海,大病了一场。

唯一能让任锡海欣慰的是,他的照片将使十号大院得到延续,让后人看到。

摄影就像一扇门

对任锡海来说,摄影就像一扇门,打开了他认知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这使他开始了对老建筑保护、人与建筑的关系等很多问题的持续关注。

多年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对待老建筑的分歧,青岛也不例外。主张保护的人认为,它们不仅代表一座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被作为历史景观和旅游资源加以利用,建议在老城区周边建设新城区,解决发展的问题。反对保护的人则认为,这些破旧的老建筑没有什么价值,它们的存在限制和影响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争论的同时,老城区的改造一天也没有停止。从青岛火车站,到波螺油子,再到中山路改造……

“里院有自身特色,代表了一段历史,一种群居文化,不应一味拆除。”任锡海说,实事求是地说,里院的居住条件较差,但是作为上世纪城市化的产物,它们承载着青岛人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过程,应当被看成是一座珍贵的、活着的、有生命的博物馆。对于一些有特色的里院区域,应该作为城市历史保存下来。

任锡海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旧城区保留下来,然后在外面另建新城区。他曾经到欧洲去看,做得好的国家都是采取这种办法。而不像我们,拆了老城建新城,而重建的是假的,没有什么价值。结果是,所有的城市都成了一个模样。

在具体操作上,任锡海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对于十号大院,可以把两间三间合成一间,这样面积就大了,可以进行功能分割了,这个屋子做成卧室,那个屋子做成厨房,哪家不想走,花点钱就可以留下来。”让他气愤的还有一些号称“修旧如旧”的老建筑保护工程。“很多历史建筑,都在修旧如旧的过程中被破坏掉了,有的老建筑,原本的木头门窗好好的,但非给换成铁的,和原来的风格不像了。国外的经验是,门窗破了,可以补上块木头,尽量和原来的样貌保持一致。”“这就就像一个老太太一样,已经老了,美就在这满脸皱纹上、历史的沧桑上,你不可能要求它像小姑娘一样,对不对?”

(文中部分资料引自任锡海著《十号大院》)